

考古学与人造物的实在性

作者：克劳斯·韩斯堡（哥本哈根大学）

译：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校：王 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导语：这篇文章发表于 1999 年丹麦《考古学报》，其时西方已进入“后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此文是哥本哈根大学考古系韩斯堡（Klavs Randsborg）教授与以哲学为先锋的人文学科的对话和辩论，是作者在“后现代”语境当中对考古学的历史、目标和任务所做的全面反思。面对西方观念论对物的实在性的质疑，韩斯堡教授证明“人造物的实在性”的合理性，指出人造物的实在性是独立自足的存在，它需要而且也能产生属于自己的方法、研究领域、甚至理论，尽管他清醒地意识到所有的理论都将面临因语言表达而造成的困境。韩斯堡教授以思想试验的方式提出了关于考古学的方法论体系，对新兴的考古学技术抱有厚望，所有这一切旨在建构一个“不那么具有解构性的世界”。

假如世界不似我们的梦，
我们就应按其原貌接受它。

一、被遗忘的维度

思考、信仰、形成意见、交流沟通以及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些构成了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实在性；矿物学和生物学则构成自然科学的实在性。

人文学科的历史根源——如果不论古物学研究的话——在于中世纪修道院构建的宗教和哲学的世界。大学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的、综合的形式之下诞生，它把医学和法学囊括进来。年轻的学科逐渐加入这个名单，但永远也不会填满它。

在这个进程中，人类行动的实物的或文化的结果被遗忘了，日常生活亦然；毫无疑问，只有在涉及艺术和建筑问题之时，日常生活才会被认为是学术世界当中有价值的素材。

考古学是有可能表明古典时期和其他古代时期历史的真实存在的，考古发现或许可以作为建构国家和地域认同感的意象。但是，总体观之，对人类物质文化及其有形痕迹（在生物学系统中）的研究从未成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核心。人类的或人造物的实在性主要留存于宗教、哲学、心理学、艺术、语言学、历史之外，这些学科作为现代学术和常常相互竞争的领域或者学科诞生于 19 世纪（参韩斯堡 1992）。

二、一个理论问题

尽管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对物质维度的兴趣有限，但它们是在关于共同的社会和文化世

界的观念之下运行的。人们相信，人的行为准则是可规约的，人的关系和发展可以被追溯。理论性话语由此做出假设：这个世界与关于该世界的学术观念相吻合。导致这个尴尬建构的原因在于，研究者主要研究的是语言资料(在此情况下，这些资料还涉及到其他范畴的信息)，进而运用语言媒介表达自己的观点。

进一步的麻烦是，研究者身处当代世界，因此其经验成为准绳，最终通过对相关性、真实性和现代性的探求而使自己的工作合法化。一个众所周知且意义非凡的例证就是，人文学科在不同国家世代接续的是一些永远不会有相同答案的问题。

就方法论而言，通过严密的分析、对资料中呈现的结构的可认及其启示，尤其是通过提出问题的方法，我们有可能使主观关系得到客观的缓解。不仅如此，对某一主题的历史研究是极其有用的、真正关键性的记述。尽管如此，关于认同和相似性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问题不在于哪种理论建构被认为是最充分的，哪种假设最令人信服；而在于，在社会科学和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的人文学科中，理论和方法论是否对研究人类的或人造物的实在性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在何种情形下、何种程度上有意义。

事实上我们已经观察到，关于物质的主题和科学——从考古学到医学——在理论话语方面相对贫乏，其原因正在于缺少文本媒介，以及缺乏对研究成果的交流（A.艾默曼，个人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研究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消息灵通的侦探所做的琐碎工作。

三、人造物的实在性

人类或人造物的实在性不仅是一个研究不足、甚至被忽略的知识领域，而且研究者将被引至现象，对于现象我们可以提出结构，但对其类型、分类和解释却又完全欠清晰。事实上，人造物的实在性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几乎不同于、因而更准确地说平行于、甚至有别于关于它的信息——假如这些信息存在的话（例如，参安德仁 1997）。

这就是物质的或可视的实在性的特点，甚至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相对而言，我们更易于掌握那些我们接受过指导或训练的资料（尽管解释的多样性不计其数），但当我们试图理解其他信息时则会面临困难，或者干脆对之视而不见。

由此，将物质的资料归诸文化、社会或历史理论在根本上是不正确的，这些理论通常出自涉及文本或语言资料的学术话语。的确，所有将物质文化转化为语言的尝试通常都是失败的，连同自身的语义学，以口头的或书写的语言。因此我在这里提出，考古学研究需要一种认识论的“飞跃”，即承认人类或人造物的实在性作为自足的独立存在物而在，它将产生自身的方法、研究领域、甚至理论。

物质的世界有种特殊的性质。不管我们身处何种时空和语境之中，不管我们身处由语词所描绘的诸如文化群体、文化发展和文化关系这些传统领域之中，还是身处由社会历史、文化融合、民族性、性别研究等现代术语所刻画的领域之中，物质的世界都是在场的。不过语词或术语并不缺少麻烦，它们在此可能是误导性的（正如在其他地方那样），因为物质的实在性通常至多平行于世界、文本和言语。心与物是不重合的，尽管心对于物的塑造非常重要。

一件看似斧头的来自过去的人工制品不一定是一把斧头；一座简陋的墓葬可能属于一位要人；房屋标准的差异也许反映不出社会的分化。

甚至关于人类或人造物的实在性的书面和口头信息也可能是误导性的。试问，我们对于自身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能知道多少呢，尽管事实是我们已适应这种文化而且能够操纵其要素，至少是部分地操纵？诚实的回答是：只有很少，这甚至也是专业人士的回答。那么，我们对于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时代的物质的实在性又能知道、且理解多少呢？

在修辞学的意义上，像“砖”或许还有“农舍”这样的语词和术语可能一望即知，尽管确定一座农舍在考古资料中会引发问题。不过，主要的难题是“社会阶层化”（social stratification）。这个术语在社会人类学及相关研究分支中有多种界定方法。但是，它还有一种超越于实际情况和总结概括的独立存在，这种存在作为社会科学和现代生活的“诸神”之一而在，与“市场”和“结构”等值——没有时空，完全不可见，难以界定。难怪对物质实在性的研究必须设定自己的标准，该标准宣称，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是平行的，在哲学意义上是独立的存在。

四、考古学

考古学是少数以人类或人造物的实在性为出发点的学科之一。因其资料的特点，考古学还获得了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亲合性，这一点在生态考古学与考古学技术中是明显的。不过，考古学的重心领域仍在其他地方，它存在于人类行动的特定的文化结果之中。

文化和社会密切相联。人类行动的物质成果自身就是重要而有趣的，不过这只当它们首先出现在考古学（及其他）资料的模式和结构中之时。一种对文化性质的简明再现是在构造的帮助下完成的，其中，个体和集体均由文化模式所塑造，同时他们也塑造着文化模式，由此他们就是在构造文化模式（参吉登斯 1987）。物质文化还参与了对人类生存的塑造，例如，作为一种人际交流和沟通的非口头的媒介，这无疑也是人类行动的结果。

在解释文化资料的实际结构的时候，考古学家常常无法确定其意义，不过他们可以选择几条进路（approach）。有两条极具自明性的进路：对物质结构进行探究，并且提出问题；它们是在把物质结构作为对过去实践的反映的前提下进行的，通常出现在年代学研究、空间或分布研究之中。在这种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史学研究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构建起一幅更为“真实的”画面，正如常常出现在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研究当中那样。

对文化资料的解释困难而意义重大，考古学家可以选择借助语言学以及传统的学科所提供的模型，尤其是社会人类学。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史前考古学研究常常运用建立在社会人类学基础之上的模型和类比，这一点绝非巧合，尽管是相当反讽的。

在过去的 30 年当中，社会人类学在考古学当中重获真实性。这一点最初是通过所谓的“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参有影响力的宾福德&克拉克 1968），后来则通过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通过后结构主义的、文化逻辑学的（culturological）“进路”而发生（一般而言，参伦福儒&巴恩 1991；霍德尔 1991；韩斯堡 1989）。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念和运动均在英语世界里（甚至常常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得到发展，并且主要为以英语作为主要语言（外语）的国家所接受，其学术思想方法因此受英国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时德法考古学研究缺少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之后，这种思想的“殖民主义”一方面移向地中海地区，一方面尝试建立一种针对考古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反思（参霍德尔 1991）。

顺便提一句，在某种更普遍、但却并非不专注的层面上，这里特别要说的是石器时代考古学和进化论的社会人类学在芝加哥的考古期刊《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当中的相遇，它们讨论的是一些考古学的、实际上就是世界史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在变化的自然环境中生物学、行为和文化的发展，即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一种古典的考古学研究的视角。

五、社会科学理论及当代考古学

1、新考古学

新考古学最为关切的核心是以科学方式展开的考察，旨在揭示过去的社会“体系”的基本进程及其在诸如聚落、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领域中的显现。在所谓的“酋邦制”（*chiefdom*）当中表现出来的过去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阶层化概念，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重要研究领域（如，参韩斯堡 1974）。新考古学的中心人物有美国的刘易斯·宾福德（“考古学要么是社会人类学，要么什么都不是”；还有重要的一点，物质文化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后来有大卫·克拉克和科林·伦福儒，这两人的确出自剑桥大学。

激进的新考古学存在着两个弱点。第一是相信应用统计概率（缺乏了急需的科学“规律”）可以验证所谓的对文化行为和文化发展（其抽象形式即为进化）的诸种解释。第二个弱点是对作为物质文化显现（甚至是实践）的文化表型（*cultural phenotypes*）的麻木，这一点是奇怪但却符合逻辑的。

这里的原因在于，社会人类学被视为是一门比文化史研究更先进的学科。“历史”概念等同于特殊主义（或者个别主义），因此与社会发展不相关。于是，主要是美国考古学家反对当地进行的多少有些僵化、尽管并非不专业的“当权派”的实践活动。后者遭到严厉批评，有时甚至是厌恶地被拒斥为仅仅是在对“文化史”进行描述。

聆听理论家的言说常常是对深层动机的揭示——通常是社会的和当代的动机，是对学术争论的揭示。事实上，像所有的政治一样，学术政治也由利益和操控所界定，不管其话语多么有用。不过政治很快就会被遗忘，而研究性的观察、经验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才是占上风的元素。

2、马克思主义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史同样持高度怀疑态度（尽管它并不怀疑社会进化和发展史），但它并不以统计学为导向，而是努力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这方面并无真正的学

术大家,尽管英国考古学家兼社会人类学家迈克尔·罗兰兹曾做出很多有趣的观察和构想。)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新考古学共享对于重大社会性“跳跃”(进化)的关切,其领域如农业起源、早期城市化和文明兴起。对国家兴起、发展及相关现象的关切尤为其典型特征。其典型言论是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的,而非政治性的;它的目标是以现代手段战胜传统,伴之以对核心考古机构的控制。

简言之,我们可以把前面引述的两种考古学运动标记为“过程的”(甚至是机械的),事实上,它们整合了环境、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关切点。两个学派或许还可以被视为是以科学为导向的、乐观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的分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间,文化研究成为史前考古学和一般考古学研究的典型特征。这些学派甚至有可能与学院派考古学(academic archaeology)最后的重要阶段相重合,之后,学院派让位于管理派(administrative archaeology)。

3、后过程主义的发展

所谓“后过程主义”学派以结构主义的哲学和研究、以物质文化的象征性为出发点(参霍德尔 1982; 韩斯堡 1993)。核心人物有伊恩·霍德尔,后来有克里斯·蒂利,二人都是英国人,实际上来自剑桥。这场运动的观点是后现代的,它对“异”而非“同”更感兴趣,并且对综合持怀疑态度。有时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除个别文化因素及其诠释外,它否定了所有其他的实在性。新考古学摒弃了物质文化,而后过程主义摒弃了进程、甚至结构,尽管承认文化变异自身的重要性。

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有价值的成就当中,有一些努力一直把文化发展基本上、尽管不是主要地看作思想的产物(霍德尔 1990),文化发展实际上就是对人类或人造物的实在性的“建构”。从某种负面角度出发,这些激进倾向甚至清除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及有文件记录)的观察,后者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和其他分支学科的信条(参蒂利 1991)。“真理”因此变得极度依赖研究者个人的观点——事实上,这是关于科学研究的极度浪漫的、甚至悲观的远见。顺便提一句,这一点与当今个体主义的倾向是等值的。

4、今天

近来,一些之前“被抑制的”或者极少得到发展的研究领域(连同其理论)走上前台,所有这些看似依赖于当代社会的特殊利益。(这个发展或许可以追溯到譬如著名的英国考古期刊《古物》的发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种深受古典学启发的发行于哥本哈根的北欧年刊《考古》。)上述这些领域如下所示:

(1) 世界体系(反思西方经济及部分文化的当代全球化。新考古学“宏大”视角的道德思想的剩余者与历史视角相结合)。

(2) 战争(在冷战僵局终结之际对于战争在现代世界的回归的鲜明反思)。

(3) 民族性、甚至是国家主义(尤其是对多元文化的西方社会的反思,以及纳粹的种

族和文化学派已远离整整一代人的事实)。

(4) 性别研究(无疑受到当代西方社会的变化的启发,包括个人主义和妇女新的社会角色的出现)。

(5) 人体学(参考关于健康和身体的现代意识)。

(6) 宗教(反思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对新价值的寻求),等等。

如上所述,对“大”问题的集中讨论使我们回溯到新考古学(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上。不过更为有趣的是,当今潮流在研究对象和主题方面多半有“一种”、或更准确地说是“多元理论的”激增。这个发展出现在史上最具规模的相对受到良好教育的考古学家中间,这是西方管理考古学(包括广泛的田野调查和发掘)的强势进步,还有信息技术在考古学当中的应用,以及电子化信息在社会上指数级的膨胀。一种新的对探究过去的技术的兴趣看起来正在兴起。这也许可以被视为是努力在今天创造一个不那么具有解构性的世界。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的自然环境在当代考古学中只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只有对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定居地景观(landscape)的研究仍然在学术兴趣中占突出地位,这无疑归因于管理文化资源的强势的管理考古学、依据法律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以及其他资金相对充足的领域。

性别和民族研究中的典型言论非常鲜明,雄性压迫、忽视文化个性和自由选择这些新观念与新型的权力关系一起出现在学界,一如普遍的社会状况。

上述观察反映的是自觉的学院派考古学研究正在进行的、而且无疑不断加剧的旨在成为“现代”的挣扎,以与自己的国家或主体社会的当代问题相关联。与其他人文或社会科学一样,考古学正在加入“灵魂之战”。但是,考古学以其物质的、因而也是无可否认的资料,还成为了反对如民族主义者和其他有着特定政治意图的“主义者”过度解释历史的行为的一面盾牌。

民族主义的案例意味深长。作为学科,考古学是在区域性的古物研究和对古代史兴趣的觉醒之下发展起来的,在当代历史的不同节点上,它曾受到民族主义典型言论的纵容,而且看似几乎被19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所征服(而非被提升)。这使得一些——通常只是几个——专业人员趋向国家政治。在树立国家、社会和经济(如广告业)的文化风格时,间或对考古学项目和历史遗迹的惹人注目的运用只是一种次要的实践,它并不能反映专业考古学的实践,后者意识到了本土的、区域性的和超区域性的物质历史的拼接组合。

于是,“借鉴的理论”既是学院派的抱负,也是考古学的志向,它把在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解释难题以及相对的学术贫困视为是在与传统的、语言学的或相似的学问进行比较。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全球范围内各个时代和地区的物质历史,学院派罕有发达的方法论准备,亦无广泛知识。

六、理论?

概括地说,独一无二的物质资料——尽管有时间间隔和表面上的沉默,使得考古学拥有

一种特殊的气质。与所有其他研究性学科一样，考古学并不仅仅以其对资料的分类和研究为典型特征，而且还以其对资料的特殊描绘为典型特征。上千个主题，扩大的专门研究以及增进的交流，这些既产生了一种新的复杂性，也产生了新的机遇，即，有可能将考古学整合成一门研究物质文化的普遍的学科。

正如最新社会模式理论的发展所证，考古资料一度几乎在现在的语词中被扼杀，它努力唤醒来自过去的新的声音。一种高层次的信息正在作为“宏大理论”的校正方法发挥作用，但是概括能力必须要得到培养。因此，除了为揭示和处理资料所运用的技术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整套工具外，所有的考古学都应拥有一个可普遍参考的、有包容原则的框架，实际上就是拥有一个理论主体。

借助在下述领域中强势而独一无二的证据——例如时间深度（常常非常可观）、地理和其他空间关系以及广泛的与背景相关的领域，所有时段和地域的历史对于考古学来说可能就是最明白无误的普遍指南。于是乎，考古学科被给予了一种通往其资料的特殊途径，并且在阐明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及其发展时获得了重要的当代地位，就像在古生物学研究当中那样（例如，参韩斯堡 1980，1991，1993；卡尔莫&罗森格兰 1997；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社会科学的方法当然也是重要的，尤其在针对资料和观察到的结构提出问题、引出文化和社会的解释模型方面是重要的。不过，前述对使用语言信息的保留态度在物质体系当中要得到尊重。这一点暗示着要不断地界定概念（以及再界定），以及寻找可能的物质表型，特别是要在特殊的社会核心定义之下，在物质的历史之中找寻。

一种普遍的研究历史中的文化和社会的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模型可能以下述人类概念为出发点：即价值观、荣誉、信念/知识、需求。

如是概念在语言学意义上是开放的，它们几乎就是要点，而观察和解释很容易围绕它们成型（韩斯堡 1995）。因此，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这些概念极具操作性。一个附加值就是，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的进路是彼此适应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经济这些传统概念曾被现代社会科学视为是恰当的维度（参“新考古学”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而言，它们更难在考古学的层面上操作。不仅如此，它们既没有考虑文化表型，又没有考虑文化实践，因此诸环节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

除上述普遍的对历史的参考外，自然科学（包括生命科学）在创立考古学之时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年代测定的物理学方法。矿物学（及技术）、地质学和过去的地理学、过去的动植物群、体质人类学、过去的生态学、自给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等等，这些显然都具有重要意义。

于是，一个全面的、技术的和分析性的考古学方法论或许应该拥有下列形式：

（1）考古学的原初资料=人类或人造物的实在性

例如：手工制品，历史遗迹（包括丧葬），居住和聚落遗迹，生物学资料（包括人类对生物系统的干预）。

（2）除引发新的资料外，为复原、记录和保存资料的原初的考古学方法；运用技术支

持。

例如：科学发掘，绘图和照相，保存技术，存档和电子资料库。

(3) 除引发新的结构外，在经过最初处理的资料的基础上，为建立结构的次级考古学方法；技术分析手段的运用。

例如：基本分类——包括对相关资料的并置和比较，背景的组合，文化类型（序列），相对年代结构，相对空间分布。

(4) 除引发新的资料外，第三级考古学方法用以解释经原初和次级处理的资料的时空结构；整合辅助性科学所做的观察与生物-文化行为模型。

例如：年代观察和假设的几率，传播和交互影响模式的解释模型，聚落的地方化模型，自给经济和其他经济模型，基本的社会结构模型（如社会阶层化）。

(5) 除引发新的观察外，由大型机构组织进行观察的第四级和整合的考古学模型；对社会科学和受历史条件限制的观察的整合；运用书写和其他象征性信息来源（图片，甚至声音）；意识形态-文化行为模型。

例如，研究的两极分别是：普遍的社会科学进路和特殊的历史进路。中程的努力包括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模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社会生态学（包括对冲突的研究）等。性别研究构成了一座通往诸如结构主义、象征主义、信仰史与思想史研究的理想化进路的桥梁。

与这些外在的、科学的方法相对，当代方法和模型的最后一种是“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考古学，即某种特殊的考古学体系的建立，其价值观基础是文化的（物质资料，结构，陈述），其“情报”就是历史和社会类比。

具体的例证就是丹麦霍尔特斯普林（Hjortspring）的军事祭祀遗址（约公元前 350 年），它介于意识形态、文化、社会和历史之间（韩斯堡 1995）。

(6) 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应该是：认知，能够进行分析和操作，并且借助深层理解、估计和多种不同方法和进路将众多相关资料和观察加以整合。这一点只有当客观性（专业的实在性知识）与经验（一种较广泛的专业的及其他的实在性知识）和想象（广泛的实在性观念）相结合时才会发生。

不过，考古学研究的兴趣和动机（包括普及）在个体、经济可能性与政治要求之间的范围之内。因此，如研究史所证，考古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其研究特点同时指向科学的背景和普遍的社会。

七、历史

在存在书写的以及图像的原始资料的时段和地域，考古学研究扮演了一个格外具有昭示性的、事实上辩证性的角色。同其他信息一样，这些原始资料一方面是学术想象的支柱，另一方面构筑起重构和解释过去的历史的“屏障”（blocks）。但考古学的目标却保持不变，即创造一种可操作的历史，由物质手段“书写”的历史。这也就是说，考古学知道（假设说）

所有类型的资料、它们的特点和证据，但其特殊的和有所限制的基础却是人类或人造物的实在性。

这样的进程只有通过全面的解释学的分析（hermeneutical analysis）才有可能实现。相应的，物质资料以在所有景观、所有文化“空间”以及所有时间段在场的方式，产生出了一定程度的整体性、发展和交互影响，来自过去的书写的原始信息在此千纪前几乎从未企及这一点，现在也只是部分地企及。

下面，我将针对上述原则给出两个例证，其一是理论的综合，其二是方法论的综合。二者都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感兴趣的，但这可能只是巧合。

第一个例证就是国家。这里，完全建立在古代书写的原始信息和其他语言资料基础之上的信息遭到了挑战，就此展开的史学研究和普遍的学术话语亦然。

众所周知，国家（连同其结构）曾经是关注的焦点，至少是亚里士多德对此做过思考和推断。讨论在文艺复兴时期继续，并且延伸到现代，其重心在于权力垄断，这一点对于保卫和维护领土以及后来的民族国家是根本性的（从一般和特定的角度出发，参克萊森&斯克尼克 1978）。民族国家与古希腊在公民权利及其义务和军事条约方面有共同的想法。

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的观念是导致社会阶层化的权力工具。与此同时，它还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和国家出现和发展的模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的研究依据的是书写的原始信息，其研究在典型意义上是广泛而强有力的，他们进而提出了国家拥有强大的由市场操控的经济体系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如何都没有、且不可能获知其他仅有简单技术的早期国家的情况，因为这些资料事实上是物质的或考古学的，它们在当时处于缺失状态。因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古代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他们并不了解早期国家的起源和存在在欧洲是超越了古典文明的。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时为考古发现和处于萌芽期的研究所包围，这些东西最终参与到提炼出考古遗迹和遗存的工作之中，这些遗迹隶属于在景观、文化和技术环境方面差异巨大的国家，如近东、印度、中国、中美洲和南美洲。在其他地区，例如丹麦，考古学出现很早，有早期国家的遗迹和发现（参韩斯堡 1980）。在全球其他地区，如非洲绝大多数地区，考古学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但无疑将为理解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甚至挑战传统定义（瑞德 1997）。

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些物质遗存在马克思的时代为人所知且被研究的话，将会对早期现代关于国家的话语产生非凡意义。或许会有些许意义，因为 19 世纪关于古典文明的考古学研究曾经是、现在依然受文本学术权威的支持。不过，假如早期国家（如同许多其他早期社会那样）在社会生活方面拥有高度共识这一点为人所知的话，则我们不能排除，关于社会阶层化的概念会有所不同。早期技术简单的国家在文化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在生活方式和宗教方面。

事实上，上述观察至少会潜在地给予关于国家的话语以一定的路径，使之远离现代主义关于政治、宪法和狭隘涉及的权力甚至经济的话题。

不管怎么说，关于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考古发现以大量的印象、信息和经验丰富了人类的

历史，它们为考古学中新的社会概念和新的研究的可能性提供了给养，前者以科林·伦福儒的“同侪政体交互影响”（Peer Polity Interaction）为例，它应用于中期和晚期青铜时代的克里特宫殿文化（参伦福儒&切里 1986）。物本身因此被给予了权威，这里说的“物”包括了关于早期纪念性建筑、礼仪、生产、贸易、商业等等的知识，考古学从语言的掌握中解放了出来，至少是部分的解放。

第二个例证是平等。这里，传统考古学的方法以及对包括丧葬在内的考古发现的社会解释遭到了挑战（参韩斯堡 1995）。下面是欧洲的年代和文化发展一览表。

时代（公元前）	希腊	中欧	丹麦
2000	“宫殿”	个体主义	
1500	宫殿	精英统治，文化竞争	
1200	崩溃	精英统治受到挑战	
1000	小城镇	小范围的精英统治，圣所	
800	城镇	对精英统治的“强烈抵制”	
500	城邦	高度的精英统治	平等主义
300	帝国	文化排斥（部分的平等主义）	平等主义

（注：很多“小城镇”实施小范围的精英统治，拥有部分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圣所的地位）

在公元前第 3 至第 2 个千纪之间，对于个体所扮演角色和地位的关切成为大部分欧洲和近东的鲜明特征，其时间甚至可推至公元前第 4 和第 5 千纪。这些关切在近东物质分化的社会当中，连同仪式中心、纪念性建筑等等一起，是与所谓的等级世系（或宗族）的出现相关联的；事实上，对最早的国家界定建立在通往空间和事物的有差别的路径之上。这种发展导向的是明显的上层集团或贵族的生活方式，无疑连同其所宣称的神圣授权（divine sanction），后者普遍为社会所模仿，并且给予其灵感。

在接近公元前第二个千纪结束之际，这种生活方式受到了各方不知名人物的挑战（可参韩斯堡 1993）。希腊和其他地方的宫殿消失了，北欧巨大的木材建成的大厅也消失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北方和南方富有的土葬墓中，精美的个人随葬品占主导，如衣物、剑、珠宝等，有铜有金。

公元前 1000 年时，贫乏的火葬墓占主导，在宗教崇拜实践上的广泛投入为此提供了证据。不过，例如在意大利和中欧，在公元前第 1 个千纪的中期，一系列富有的新墓葬出现了。这暗示着那种实际上与城市化中心相关联的公开的贵族生活方式的回归，至少是在某些地区。公元前 6 世纪，通过诸如与南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Etruscan）和希腊殖民地的关联，中欧的王公贵族试图像真正的“暴发户”那样现身，他们把“自身文化”（Eigenkultur）与主导南方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标准结合起来（克米什 1983）。

为了全面理解这个物质的-历史的整合和推论的案例，我在此提出两个简洁的看法。

第一个，墓葬和随葬品并不必然地反映真实的社会结构，对此的探求多根据社会阶层化概念而做出。在不强调物质层面的墓葬和随葬品的前提下，“王公贵族”或者其他上层统治集团仍然可能存在。这个见解是根据欧洲北方-阿尔卑斯山地区在公元前第 1 个千纪中很多具有上层集团标记的贵重物品的礼仪性埋藏得出的，这个时段中几乎所有的墓葬都是“贫穷的”。

第二个见解或许可以取自约公元前 300 年之前的希腊社会中显而易见的平等主义道德观，尽管其时主导者是特殊的社会群体（男性公民）。在爱琴海，反对精英统治的程度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源头，最为激进的就是始自公元前第 1 千纪中期的宪政民主。但是，事实上，民主制及其对手专制制度都可以被视为是为平等主义文化而创立的政体，该政体与传统的贵族统治相对抗。在物的层面上，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体现在著名的有着良好规划的城市之上，其间个体住宅的布局大小相同。不过，这种强势的平等主义倾向并没有排除上层集团结构的同时并存，例如在财富分配方面，也不排除那些生而为贵族的上层集团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参与。

与“史前的”欧洲相适应，这些观察暗示着，一种“遇到挑战的”贵族政体是隐身于晚期青铜时代的仪式性埋藏背后的，比如说在丹麦，从公元前第 1 个千纪开始出现的昂贵的礼拜用品——仪式用斧头，青铜盾牌，青铜器，金碗，沉重的金指环，精美的剑和青铜长矛，特别是很多沉重的女性用的青铜首饰。所谓的上层集团很少用物的方式——例如丧葬——把自己作为个体加以表现，而似乎是通过崇拜和宗教的方式为之。于是，所谓的晚期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对于特殊的黄金世系的“神化”终结了，事实上，这或许同时开启了一个人格化的众神的世界。

在公元前 500 年之际，激进的文化平等主义被引入丹麦，正巧与希腊民主制同时。其时，甚至仪式用金属人工制品埋藏数量大大减少，尤其是金属的价值减小了；同时，密集聚落模式由众多小型农舍组成——单个的家庭控制着家畜，这是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而且无疑也是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指示。没有小城镇的痕迹，但是，从装备有相同的铁质长矛和盾牌的以步兵为主体的军队中，我们探查出高级社会组织的存在——这是对当代希腊和其他地中海地区国民军的一种远距离反射（韩斯堡 1995）。

于是乎，借助古希腊在平等主义与精英统治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模式之间的转换，我们有可能考察公元前第 1 个千纪欧洲大部地区的发展。北欧和东欧（至大草原北部）一般而言是以平等主义倾向为典型特征。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富有的位于南意大利的“大希腊-Magna Graecia”以及埃特鲁斯坎），以及在中、西欧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凯尔特人等中间），精英文化在第 1 个千纪中期占主导地位。

再者，从公元前 400 年左右开始的移民时期的开端起，早期的凯尔特上层集团采纳了旗帜鲜明的平等主义的和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在文化上背离了地中海地区，早期对南方标准的采纳告一段落，相反，他们自身的典型风格以例如注重装饰的形式显现出来。文化层面上的

平等主义表型可能在这个时候被运用，以捍卫传统生活方式，对抗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过度的希腊化，正如后来罗马帝国时期的日尔曼人的所为。

认同古希腊文本的历史学家视上述现象为北方民族文化“野蛮主义”的例证，这是一个学术层面的反讽。事实上，凯尔特人和其他民族身上所反映的正是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的在其自身与蛮族之间的著名的希腊式区分。人们可能并未意识到，同期的“蛮族”所遵循的正是希腊式的（以及后来的罗马式的）感知和行为。对种族的区分看似存在着一种相互认同，因为在古代世界极其剧烈地增长的交互影响时期，这种区分在文化和政治上是有用的，其情形一如今天的全球化时代。

希望这两个例证得以证明，首先，物质文化极其重要的历史潜力不仅存在于有指示意义的模式当中，而且存在于重大和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变化出现之时。其次，在历史整合当中物质文化的潜力，以及以开放的心态使用除书写文本和建立在语言之上的学术研究之外的资料的必要性。

人类或人造物的实在性实际上是最为全面的历史文化实践。它既是创造，又是对意图和行动的反映。而且，它极其复杂，涉及众多博学的语境。一言以蔽之，“凡手所塑造的东西，都有精神的痕迹。”（延森 1925）。

八、结论：考古学的方法论

假如视觉是沟通方式，言说是语言；假如仪式创造着一个信仰体系，正如目前所认定的，那么物质文化难道不是在创造一个社会吗？

人类或人造物的实在性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有所欠缺的领域。这些研究的主要分支直到今日一直为人类的思想、语言沟通、行动和社会组织所主导。物质文化的实在性尽管有其简单的、可视的维度，但我们对其理解却是贫乏的，而且那些由语言提供资料的学科及其研究对此几乎不做讨论。

在考古学中运用的来自语言学科的术语和概念（这是近年受到理论滋养的和社会人类学启发的考古学研究中的实情）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困难不仅仅在于“翻译”，因为物质连同其资料是一个自在的世界，其特点和本质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各地，在人类各个时段；换言之，物质甚至超越了有形文本和其他文本的领域。应该有一种考古学的理论以避免建立在语言学科之上的术语，尽管当涉及到解释和历史整合的时候，这一点几乎是不现实的。

物质世界要求自身的技术、方法和假设，甚至是理论进路。一个简单的翻译实际上就是把过去（以书写的历史信息的形式）与现在（研究文本）并置、或把过去（以考古发现的形式）与现在（以解释过去的形式）并置。

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旅行——过去和现在之间，学术研究与日常生活之间——要求极高。它要求充分研究、详细分析、解释，甚至还要求细节；事实上，它要求的是一种全面的方法

论。这里没有捷径，而且考古学的问题永远都不能被特殊的理论和关于文化与社会假设所替代。此外，类比研究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假设领域，它应该成为解释的灵感来源，而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镜子。既然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几乎是不存在的（最接近的是由生物学决定的行为），那么，所有的文化表型都应成为关切点，因而加以澄清、讨论和解释。“宏大理论”应该在此光照下加以评估，而非相反。

据说可以把考古学的领域（以及普遍的对物质文化的学术探究）简洁地、从根本上界定为对物质史的解释学研究。这根本不能排除考古学资料和观念是从人文学的“语言学科”或者从社会科学当中召集的，也不能排除对于科学信息的运用。

进一步说，以其空间的整体性和深度历史概念，考古学相似于古生物学和天文学，它们都不完整，仅能部分地理解，尤其是，它们只是间接的物质资料。考古学还拥有—种显著的智性潜力，普遍的娱乐价值，尤其在对人类具有重大的普遍意义的领域当中，考古学具有巨大的清晰阐明的力量（如，曼泽尔 1994）。

对于当代考古学而言，最大的道德问题就在于，它缺乏在与今天的社会“同时共在”（contemporaneity）时的学术透明性、视角和相关性（以其有限的历史直觉和知识）。对物质史概念的与日俱增的交流沟通、指导和工具化，可能会抵消这些倾向。简言之：

（1）人类或人造物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它不能仅仅通过书写的和口头的实在性、或者通过隶属于它们的学科加以理解。

（2）但是，文化层面上的物质世界能够书写它自身的历史——涉及所有时段和空间，这种历史一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与历史平行，因而它甚至超越于文本领域之上。

（3）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要求其自身的方法论和理论，正如考古学所发展的那样，即理想的理论是拥有自身的语言，但这一点只能部分地实现（并且在根本上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实现）。

（4）物质文化事实上就是实践，但对其解释是不确定的，我们的研究应该照此方法进行。

（Klavs Randsborg, “Archaeology and the Man-made Material Reality”, in *Acta Archaeologica*, vol.70, 1999.）

参考书目

Acta Archaeologica (Copenhagen) 1ff. 1930 ff.

Andr n, A (安德仁). 1997. Mellan ting och text. En introduction till de historiska arkeologierna. Stockholm/Stehag (Brutus  stling Bokf rlag Symposion).

Antiquity (Cambridge) 1ff. 1927 ff.

Binford, S.R. & L. Binford (宾福德) (eds.) 1968. *New Perspective in Archaeology*. Chicago

(Aldine).

Callmer, J. & E. Rosengren (卡尔默&罗森格林) (eds.) 1997. "...gick Grendel att söka der höga huset...". Arkeologiska källor till aristokratiska miljöer i Skandinavien under yngre järnålder. Rapport från ett seminarium i Falkenberg 16-17 november 1997.

Clarke, D. L. (克拉克) 1968. *Analytical Archaeology*. London (Methuen).

Claessen, H. J. M. & P. Skalník (克拉森&斯克尔尼克) (eds.) 1978. The Early State. New Babylon in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Hague (Mouton).

Current Anthropology (Chicago) 1ff. 1960 ff.

Giddens, A. (吉登斯)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odder, I. (霍德尔) 1982. *Symbols in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 Structure and Contingency in Neolithic Societies*. Oxford (Blackwell).

-1991.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Europe. The Last Three Decad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Jensen, J. V. (延森) 1925. Hvor smiler fager den danske Kyst (poem). *Folkehøjskolen Sangbog* (no. 228). 16th ed. Odense 1974.

Kimmig, W. (克米什) 1983. Sie griechische Kolonisation im westlichen Mittelmeergebiet und ihre Wirkung auf die Landschaften des westlichen Mitteleuropa. *Jahrbuch des römisch-germanischen Zentralmuseum Mainz* 33.

Menzel, P. (曼泽尔) (et. Al.) 1994. *Material World. A Global Family Portrait*.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Randsborg, K. (韩斯堡) 1974.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Early Bronze Age Denmark. *Prähistorische Zeitschrift* 49.

-1980. *The Viking Age in Denmark. The Formation of a State*. London/ New York (Duckworth/St. Martin's).

-1989.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Scandinavian View. *Acta Archaeologica* 60.

-1991. *The First Millennium A.D. 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Archaeology and the Man-made Material Reality*.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3. Kivik. Archaeology & Iconography. *Acta Archaeologica* 64.

-1995. *Hjortspring. Warfare & Sacrifice in Early Europe*.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Reader, J. (瑞德) 1997/1998. *Africa. A Biography of the Continent*. London (Hamish Hamilton/Penguin).

Renfrew, C. & P. Bahn (伦福儒&巴恩) 1991. *Archae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London (Thames & Hudson).

Tilley, C. (蒂利) 1991. *Material Culture and Text. The Art of Ambiguity*. London (Routledge).

(原载于《南方文物》2017年第3期)